



著作出版与学术传承

范 凡◎著

圖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本书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9YJA870001)基金资助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 著作出版与学术传承

范凡 著

圖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出版与学术传承 / 范凡著.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 - 7 - 5013 - 4717 - 9

I . ①民… II . ①范… III . ①图书馆学—研究—中国—民国 IV . ①G259. 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76660 号

书名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出版与学术传承

著者 范凡 著

出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发行 010 - 66139745 66151313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 (传真) 66126156 (门市部)

E - mail btsfxb@ nlc. gov. cn (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投稿中心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毫米) 1/16

印张 22. 25

字数 560 千字

版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013 - 4717 - 9

定价 64. 00 元

序

2005年初,我曾写过一篇小文《图书馆学前辈学术著作的传与读》(见《图书情报工作》2005年1期),提出在图书馆学界加强专业学术史研究与开设专业学术史教育的意见。而此时,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博士生范凡女士刚入学不久,她愿意就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的出版与学术传承作为主攻方向。经过四年的努力,她完成了约30万字的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出版与学术传承》,并于2008年6月如期通过论文答辩。论文在对民国图书馆学著作出版的背景、著作数量等总体情况加以陈述分析后,分图书馆学通论、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史、图书馆建筑设备和图书馆管理法、图书分类和编目、目录学等五个专题,分别就其著作的出版及学术传承作了深入研究,另对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期刊作了简括的介绍,统计了这一时期创办的113种图书馆学期刊,并对期刊所涉及的一些重要论题进行了剖析。论文最后对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的时代特征与学术成就加以总结。论文有多种统计数表,又附《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书目》,详列其时出版的943种著作,其资料性弥足珍贵。

在20世纪的80、90年代,中国图书馆学史的研究就已有了一定的成就,武汉大学与北京大学已有数篇相关硕博学位论文的完成,而台湾蓝乾章,大陆程焕文、王子舟等人的研究,也有不少重要成果问世。这些成果为图书馆学史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对于1949年以前近千种图书馆学著作及大量学术论文而言,现有的研究仍嫌不足。

中国学术史研究有着优良的传统。从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戴望的《颜氏学记》,到梁启超、钱穆的近三百年学术史研究,直至当代张舜徽先生的《清儒学记》,学术史研究一脉相传,其方法虽各异,其内容或趋同。就学术史具体内容而言,约略有如下数端:

- (一) 学人的学术经历、撰述、学术思想的评述等;
- (二)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学人学术传承与学派;
- (三) 一个时代的学术基础(教育、出版与学术杂志等)、学术思潮以及对学人的影响。

学术史的目的,是可让后学知晓学术发展脉络,学术的精华与糟粕,让“上下诸先生,深浅各得,醇疵互见”(《明儒学案》黄黎洲先生原序,中华书局,1985),并为当代学术的发展奠定基础。当然学术史还有另一层重要的意义,如张舜徽先生所云:“我们总结前人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时,除条理史实外,也还有观摩借鉴的一

面。对他们的为人处世之道,进德修业之方,都要认真体认,引归身受。他们好的言论行动,可资学习;缺点错误,可为厉戒。”(《清儒学记》自序,齐鲁书社,1991)

随着现代学术的建立与学术的分科,专业学术史的建立更受学术界重视。我在给研究生上文献学课时,曾列《20世纪重要文献学家简表》和《20世纪重要图书馆学家简表》,供学生学习时参考。我本人并不专门从事图书馆学史研究,只是长期在图书馆学领域执教,深感图书馆学史对教者、学者均具有基础性意义。

最近欣闻范凡女士的博士论文经过认真修改即将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是为民国时期图书馆学学术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基础,可为今后民国时期图书馆学学术史的建立做出贡献。

本书的作者范凡女士,是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我对她的学业与为人均比较了解。她在北京大学四年 的学习中一直很努力,完成各项功课,参加课题研究与学术活动,撰写论文,表现出类拔萃。

作者研究的主要领域为图书馆学。在读博士之前,她在图书馆有过十年的工作经验,并有较好的文献学功底,这为图书馆学研究提供了厚实的基础。读博士期间,在图书馆学领域参与几项课题研究,并都有出色表现。如参加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中国文献学研究”,参与教育部北京大学985项目“20世纪图书馆学研究”等。先后发表二十余篇有份量的学术论文,如《晚清至民国时期私立图书馆研究》、《中国图书情报学院间 的合作和资源共享》、《阅读倾向研究述略》、《陈登原及其文献学论著》等。她学风端正,吃苦耐劳,刻苦用功,在科研上富于创新精神;并能团结互助,谦虚谨慎,具备良好的合作精神。这在风气浮躁的今天,难能可贵。

作者自2008年担任《大学图书馆学报》编辑以来,凭借她的专业知识和实际经验,积极推动图书馆史和图书馆学史的研究,在学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相信作者今后在图书馆学学术史研究方面一定会取得更大成绩。

是为序。

王余光
2011年3月24日
于畅春园

前　　言

本书由博士学位论文发展而来,经过三年的修改和沉淀,终于要和大家见面了。

本书以民国时期出版的图书馆学著作为研究对象,从它们的产生背景、研究内容以及对当时和后世所产生的影响,来考察民国时期图书馆学的发展历程,总结其在学术史上的独特地位,明辨其是非得失,以鉴古知今、继往开来。

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著作是一座宝库,由于历史的机遇,使我非常幸运地抢先得到了开启这扇宝库之门的钥匙,我希望在我的寻宝之旅结束之后,能够给后来进入者留下一个个真实、有用、清晰的路标,使人人得享我们的图书馆学先辈们留下的宝贵财富,希望我的研究能够实现这一愿望!

全书共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研究民国时期图书馆学史,尤其是图书馆学著作的重要意义。通过文献综述发现民国时期图书馆学史,以及图书馆学著作的研究都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在学术传承方面更是如此。

第二部分先论述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出版的背景,一是回顾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著作的出版概貌,二是从晚清以来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图书馆学教育的兴盛、图书馆学专业人才的涌现等各个角度进一步论述其背景。

第三部分总结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的时代特征和学术成就。

本书全面调查了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出版的整体情况以及主要图书馆学期刊论文的出版情况,分主题、系统地梳理了民国时期重要图书馆学著作之间的学术发展脉络,初步理清了作者群体间的学术传承关系,发现了许多新材料,纠正了以往一些错误认识。

本书创新之处在于它是第一次从著作的出版与学术传承这个角度入手来研究民国时期图书馆学史,考察的是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的整体出版情况,从而避免在重点列举中产生挂一漏万的现象,使各学派得以全面反映。在此基础上,对一些重要学者及著作进行分析,并在每一章之后总结同类著作在学术上的传承关系。此外,本研究还是民国时期图书馆学学术史研究的一个基础性工作,可为今后民国时期图书馆学学术史的建立做出贡献,同时也为今天图书馆学的发展,以及图书馆学教育,尤其是高层次教育提供借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回顾在北京大学四年的求学历程,我的每一个进步都渗透着导师王余光教授的辛勤汗水,尽管在进入北大之前,我从事图书馆学专业学习和工作已经有十八年,但是真正严格的学术训练和终身的研究兴趣却完全来自于导师的言传身教,在

这里我想表达对我导师深深的谢意！

感谢在我的论文开题、预答辩、匿名评审、答辩等一系列过程中提出了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的各位老师：朱天俊教授、郑如斯教授、张树华教授、吴慰慈教授、王锦贵教授、王子舟教授、李国新教授、刘兹恒教授、杨沛超教授、李万健研究馆员、李常庆教授、张久珍副教授。感谢所有培养、帮助过我的老师们。感谢所有读过我的论文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的老师和同学们，他们的鼓励和期盼增添了我将本书出版的信心和勇气。

感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亚洲传播资源中心 ACRC 项目给我提供了学习和研究机会，Abdus Sattar Chaudhry 副教授和 Christopher Khoo Soo Guan 副教授的指导使我的专业视野更加开阔。

我还要感谢四年间与我亲密相处的姐妹们：唐承秀、陈雪飞、王丽华，是她们热情的鼓励和督促，才使我能够与大家一起顺利地完成学业。

特别要感谢的是我的家人，没有他们的支持，就没有我学业的完成。我的父亲虽然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四年了，但他老人家的教导一直是我人生的准则：“生活上向最低标准看齐，学习上向最高标准看齐。”我七十多岁的老母亲不仅没有享受过一天小女儿承欢膝下的快乐，而且她还需要时时向我伸出援助之手。我的两位哥哥全家以及远在大洋彼岸的姐姐一家，都养成了每周至少打一次电话给我的习惯，随时帮我解决学习和生活上的各种难题。我的丈夫郑志勇独立担负起照顾孩子和家庭的重任，曾经两次重病累倒；我的儿子郑仲奇小小年纪就承担起很多本应该由我来承担的责任，很少享受到母爱。我愧对他们！

最后要感谢的是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金丽萍、邓咏秋老师对本书出版的大力支持。

范凡 谨记
2011 年 3 月 22 日
于北京大学图书馆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出版的背景	4
第一节 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著作出版概貌	4
第二节 晚清至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11
第三节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的兴盛	18
第四节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人	27
小结	32
第二章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出版情况总体分析	34
第一节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出版数量统计	34
第二节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出版的各项分布特征	36
第三节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的作者群	51
小结	63
第三章 图书馆学通论	65
第一节 东西洋图书馆学术流入时期的图书馆学理论著作	65
第二节 中国图书馆学术发轫时期的图书馆学理论著作	73
第三节 民众图书馆学研究	91
小结	99
第四章 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史	102
第一节 图书馆事业调查	103
第二节 图书馆事业的法令、规划和总结	112
第三节 图书馆史	125
小结	131
第五章 图书馆建筑设备和图书馆管理法	134
第一节 图书馆建筑设备	134
第二节 图书馆管理法	137

第三节 读者指导	155
小结	165
第六章 图书分类和编目	167
第一节 图书分类法著作	167
第二节 图书编目和标题研究	186
第三节 排检法和索引法	198
小结	204
第七章 目录学	206
第一节 目录学译作	208
第二节 新旧并行的目录学著作	212
第三节 传统目录学著作	224
小结	235
第八章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重要论文研究	238
第一节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期刊概述	240
第二节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期刊的研究话题与时代特征	248
小结	272
结 语	274
第一节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的时代特征	274
第二节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的学术成就	275
参考文献	278
附录：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书目	289

图表目录

表 1-1 民国时期 5 大图书馆学系科课程设置	22
表 1-2 民国时期图书馆短期训练班、函授学校	24
表 1-3 民国时期留学海外的第一代图书馆学家(按留学时间排列)	29
表 2-1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篇幅统计	37
表 2-2 1902 年至 1950 年 6 月间商务出版的图书统计表	41
表 2-3 1909—1949 年图书馆学著作出版年代统计	42
图 2-1 1909—1949 年图书馆学著作出版年代分布图	43
表 2-4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内容排序	45
表 2-5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翻译著作一览表	47
表 2-6 出版 2 种以上著作的著者一览表	51
表 2-7 杜氏从著分类表	53
表 2-8 核心作者的著作所涉及的研究领域统计表	54
表 2-9 文华图书科 1922—1928 年毕业生去向统计表	60
表 2-10 《图书馆学季刊》“著者略历”栏目介绍著者人次统计表	61
表 3-1 藏书楼与图书馆之比较	80
表 5-1 民国时期出版的“阅读指导”著作一览表	161
表 6-1 “增改杜威派”四大分类法大类比较表	183
表 8-1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期刊统计表	241

绪 论

张岱年先生说：“辛亥革命至一九四九年，史称民国时期。民国时期是充满了内忧外患的时期，但是当时的学术界确实出现了很多有一定价值的学术著作。民国时期的学术著作，有许多现在已买不到了，而实际上确有了一定的参考价值。”^①对于图书馆学来说，情况确实如此，关注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的出版与学术传承已经成为迫切的现实问题。

民国时期正是清末以来被人们当作一种教育机构的图书馆事业发展壮大的时期，东西方图书馆学思想、图书馆学教育、图书馆经营理念和技术大量涌入，随后又纷纷打上了中国特有的烙印，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为数众多的图书馆学著作，它们反过来又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推波助澜。本书意欲从这些著作入手，从它们的产生背景、研究内容以及对当时和后世所产生的影响，来考察民国时期图书馆学的发展历程，总结其在学术史上的独特地位，明辨其是非得失，以鉴古知今、继往开来。

那么疑问也许会由此产生：仅仅从著作入手，就能实现这个目的吗？沈祖荣先生说：“时代是著作产生的，著作又是时代产生的。彼此循环的产生。”^②笔者相信，作为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和图书学发展产物的图书馆学著作，也一定能够为今人还原那个时期的真实面貌。

研究范围界定

民国时期人们对于图书馆学的范围有多种认识，在此无意判定究竟哪种认识更正确，只是想弄清楚，当时人们所认识到的图书馆学的范围究竟有多大，有哪些是共同的，进而确定本书所要研究的图书馆学著作的范围。

1. 图书馆学的范围

杨昭慈在他的《图书馆学》一书中，引用德国马叶氏百科全书上的说法，把图书馆学定义为“关于图书馆的理论和技术知识的总和为系统的研究。”^③由此，他划定了一个“两大类六层次”的图书馆学的范围，所谓的两大类就是指“纯正的”和“应用的”两大类。处在最上层的是图书馆学，处在最下层的有：^①图书馆史、印刷

^① 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张岱年] 序

^② 沈祖荣. 图书馆用不着杂志么. 见：丁道凡搜集编注. 中国图书馆界先驱沈祖荣先生文集 1918 ~ 1944 年. 杭州：杭州大学，1991：50

^③ 杨昭慈. 图书馆学(上、下).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11

史、图书史；②图书馆统计、图书统计；③图书馆法规、协会章程、馆员优待条例；④图书馆教育；⑤编目法、分类法、装订法、评价法、登录法、统计法、打字法、印刷法、选择法、簿记法、广告术、建筑法、参考书使用法、书架整顿法、打字机使用法、图书馆报告法；⑥管理法、组织法、图书馆视察法、图书馆经济学。

杜定友对图书馆学的范围的认识，一直处于不断充实和发展的过程中，他于1925年出版的《图书馆通论》，将图书馆学的范围划分为“专门的”和“辅助的”两个方面。前者包括理论方面（图书馆学之种种原理、图书馆学及图书馆史）和实用方面（行政管理、处理书籍、指导阅读、教育联络），后者包括专门科学（印刷术、装订法、统计学、新闻学、博物院管理法）和普通科学（文学、哲学、教育学、社会学〈史地〉、心理学、演讲术、广告术、论理学、外国语三四种）。^① 1932年出版的《图书管理学》和《新中华图书管理学》^②中，也都探讨了“图书馆学的范围”：（一）专研究图籍之印刷出版等科目；（二）专研究图书馆管理方法之科目；（三）专研究关于图书馆行政之科目；（四）其他必修科。^③

刘国钧在他的《图书馆学要旨》一书中也对图书馆学的范围作了界定：“什么是图书馆学？图书馆学便是研究图书馆的组织法、管理法和使用法的学科。”^④同时，他认为图书馆学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图书馆学包括对图书、图书馆人员、图书馆设备和图书馆管理方法各方面的研究，而狭义的图书馆学往往只指最后一项，就是所谓图书馆管理法。^⑤

杨昭惪、杜定友、刘国钧三人的图书馆学理论著作是民国时期图书馆学由引进到成熟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代表作，他们对于图书馆学的范围的划定虽然在语言表述上不尽相同，但是本质上的差异并不大。所以本研究直接采用刘国钧所说的广义图书馆学概念来界定图书馆学的范围。

2. “中国的图书馆学”

梁启超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大会上，对于什么是“中国的图书馆学”作了界定，他说：“图书馆学的原则是世界共通的，中国诚不能有所立异；但中国书籍的历史甚长，书籍的性质极复杂，和近世欧美书籍有许多不相同之点。我们应用现代图书馆学的原则去整理他，也要很费心裁，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事整理之人，须要对于中国的目录学（广义的）和现代的图书馆学都有充分智识，且能神明变化之，庶几有功。这种学问，非经许多专门家继续的研究不可，研究的结果，一定能在图书馆学里头成为一独立学科无疑，所以我们可以叫他做‘中国的图书馆学’。”^⑥

① 杜定友. 图书馆通论.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42－44

② 杜定友. 新中华图书管理学. 上海：新国民图书社，1932

③ 杜定友. 图书管理学. 上海：中华书局，1932：285－287

④ 刘国钧. 图书馆学要旨. 上海：中华书局，1934：2

⑤ 同上：13－14

⑥ 梁启超. 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25（1）：11－14

他所提出的“中国的图书馆学”，就是现代图书馆学与中国目录学的有机结合。

3. 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著作

本书对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的认定，就是基于上述学者对图书馆学和中国图书馆学的认识。凡是那个时期出版的著作，所讨论的内容属于以上范围的，毫无疑问就应当是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然而，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究竟有哪些，却不能仅仅依靠随机判断，还需要依靠当时的书目记载来验证、来补充。

从民国晚期编制的《图书馆学书目》^①来看，当时图书馆学的主题内容大致有以下 14 个方面：目录学和图书学、排检法、索引法、印刷和出版、图书馆学总论、建筑与设备、行政、管理、特种图书馆、专门图书馆、普通图书馆、图书馆学教育、历代公私藏书、文书和档案。其中的每个主题又可以细分。从这个书目的序言中得知，该书目所依据的来源也都是民国时期编制的图书馆学目录，如孔敏中的《中国图书馆学术文字索引》、徐念轩的《图书馆学论文索引》、杭州流通图书馆的《图书馆学论著的介绍》，以及《图书馆学书目题识》、《图书馆学书目解题》、《图书馆参考书目》等，所以该书目所划分的这些主题应该是既有依据，又得到大家普遍认可的。

1958 年，李钟履编制的《图书馆学书籍联合目录》中共有 142 个主题，主要是依据清末至 1957 年间出版的、仍然在各大图书馆有所收藏的图书馆学书籍来划分的。除了 1949 年以后带有时代特色的主题以外，剩下的主题完全能够与上述《图书馆学书目》的主题相对应。

所以，如果将包括上述二个书目在内的同类书目收集起来，删除其中的重复内容，所得到的就应该是比较完整的民国时期出版的图书馆学著作目录了。但是限于时间、精力和能力，本书打算对这些图书馆学著作再作进一步限定。以下主题的著作，由于其数量庞大，暂不讨论，留待以后研究：

第一，各图书馆或个人编制的各类书目、提要和索引等；

第二，文献目录学中文献学专题研究，以及专书的考证等；

第三，阅读指导、读书方法等；

第四，各类型图书馆的概况、介绍、阅览规则、年度工作报告等。

此外，民国时期有些图书馆界人士出版的图书馆学著作很少，有的甚至连一本也没有，其学术观点主要体现在所发表的论文中，或者其重要活动曾在图书馆学期刊上有所报道，所以本书也要对民国时期的重要图书馆学期刊上发表的重要图书馆学论文进行分析，以补充单纯研究图书馆学著作所造成的不足。

^① 注：《图书馆学书目》是宋傅山、钱世良和周世瑶三人在 1946 年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馆学系毕业时提交的毕业论文，具有较高的水平。后被收入到重庆市图书馆编制的《图书馆学论文资料索引》中，成为其中“一九四六年四月以前论文资料部分”。

第一章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出版的背景

民国时期,是中国图书馆学著作出版的重要时期,其整体状况可以用“由少到多、发展迅速、涵盖全面”来描述,但是这种盛况的出现并非空中楼阁,而是由多方面的历史和现实背景所决定。首先,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出版与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著作出版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发挥的历史作用不同: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著作起到了使图书馆事业在中国得以确立的鼓吹作用,而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直接为图书馆事业在中国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具体的方法论指导。其次,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出版是满足晚清以来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要求的必然产物。图书馆事业专门领导机构的设立及其图书馆法令法规的颁布、地方性和全国性图书馆行业协会的设立、图书馆学教育机构的兴办,以及图书馆开展的社会教育的显著成果,都为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的出版奠定了必要的社会基础,其中图书馆学人更是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第一节 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著作出版概貌

关于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著作的出版情况,李希泌、张椒华的《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已经做了很好的资料准备工作,而程焕文的《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以下简称《晚清》)又加之以更广泛的资料,进行了更为全面而透彻的研究,从著作类型到作者主体,从思想内容到社会影响,涵盖无遗。本节即主要借鉴、吸收这二者的成果,来反映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著作的出版概貌。

程焕文对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著作及图书馆学术发展有一个总体看法:“在晚清时中国并没有出现中国人自撰的图书馆学术著作,这亦是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尚不足以构成一个新的学科体系的原因之一,中国人自撰的图书馆学术著作直到民国初期才开始出现,那时中国的图书馆学术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①

按照他们的观点,当时有关图书馆的著作的作者主体,可以划分为五大群体,即西方传教士、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维新派、清末新政期间的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以及清末地方士绅。他们都不是专门的图书馆学专家,只是在他们的著述中,

^① 程焕文.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337

或提及、介绍西方图书馆学，或奏请设立图书馆，甚至制定图书馆章程。而关于文献目录学方面，“清末的最后几年曾经出现过叶德辉的《藏书十约》和《书林清话》等颇为后世重视的著作，但是由于这些著述产生之日也正是清王朝行将灭亡之时，所以它们对晚清藏书思想和图书馆学术思想发展的影响甚微”。（《晚清》第47—48页。本节中凡援引《晚清》一书，只随文夹注引文出处，而不另行出注。）

一、西方传教士

西方传教士群体对图书馆的介绍，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明天启癸亥年（1623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完成中文译著《职方外纪》，最早向中国介绍17世纪初欧洲国家的图书馆情况。作为第一部向中国介绍西方图书馆事业的著作，该书的历史意义体现在西文“图书馆”一词的传入和西方图书馆观念的传入两个方面。但是该书自问世以来一直不被人们重视，从《四库全书总目》对它的评价中可见一斑，直到林则徐和魏源“开眼看世界”时，该书才重新受到重视（《晚清》第53、57页）。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传教士的著述开始在中国士大夫中传播，并发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如：英国传教士马礼逊著《外国史略》多次提到西方国家的藏书和图书馆；美国传教士祎理哲著《地球说略》，更为详细地介绍了西方国家的藏书和图书馆；美国传教士戴德江著《地理志略》，所提及的西方国家的藏书和图书馆比以上两书更多；美国传教士高理文著《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是记述美国的专著，因而对美国的图书馆记述比较多也比较详细。此外，英国传教士慕维廉所著《地理全书》和《万国地理全图集》等早期西人著作中，也有对图书馆的零星报道（《晚清》第70—73页）。

二、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

鸦片战争后，林则徐和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们分别编撰了《四洲志》和《海国图志》。《四洲志》主要译自于1836年伦敦出版的慕瑞著《世界地理大全》，叙述五大洲各国历史、疆域、政治等概况，其中对欧美各国，尤其是对美国各州图书馆的藏书和图书馆的记述不少。林则徐将西文的“图书馆”一词，翻译为“书馆”，比西人翻译为“书院”更确切，更易被国人理解。《海国图志》增补了《四洲志》对西方公共图书馆的宣传介绍，更有利于中国人进一步认识和了解西方的公共图书馆（《晚清》第141、148页）。

鸦片战争以后，到欧美日去学习、访问和工作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不可避免地接触到西方近代文明的标志——图书馆，一些人将这方面的见闻记录下来，在国内加以传播。

如斌椿父子所著《乘槎笔记》记录了一些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历史。志刚所著《初使泰西记》，有一处涉及图书馆。张德彝所著《再述奇》记录了在纽约参观公

共图书馆的情形，并且他已经注意到西方公共图书馆与中国藏书的差别，也就是公共性和平民化（《晚清》第 98—103 页）。

王韬先后撰述了《漫游随录》和《扶桑游记》，侧重于对东西洋图书馆的考察，他已经将“开书籍馆”提高到了“维新”和“专尚西学”的认识层面（《晚清》第 104—109 页）。

郭嵩焘所著《伦敦与巴黎日记》注意到了西方呈缴制，以及西方图书馆在管理上与中国不同的两大特点，一是卡片式目录，二是图书馆分类。刘锡鸿所著《英轺私记》反映了他在看到大英博物院图书馆时受到的难以置信而又不屑一顾的强烈震撼，反映出封建主义思想在西方文明前打败仗的情形。此外还有张德彝著《四述奇》，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第一批驻外史官对西方图书馆的接触和认识。

曾纪泽的《出使英法俄国日记》中非常简略地提到了参观英法图书馆，李凤苞的《使德日记》对德国图书馆进行了详细的考察。薛福成的《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记述了参观梵蒂冈图书馆和欧洲其他各国图书馆的情形，综述各国图书馆藏书情况。而且他还把中国的藏书与西方的图书馆进行了横向比较，突出强调江南三阁所具有的“公”的性质，表明他对近代图书馆的认识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记述了外国的监狱图书馆。蔡尔康、林乐知编写的《李傅相历聘欧美记》，提到了李鸿章参观国会图书馆（《晚清》第 109—127 页）。

洋务派创立的同文馆开始有藏书活动，《同文馆题名录》有《同文馆书阁藏书》，记述该阁存储汉洋书籍、学生应用各种功课之书，以备查考。^①

清末新政时期，出洋大臣载泽的《考察政治日记》只有两处提及参观图书馆，戴鸿慈的《出使九国记》对图书馆的记述相对全面一些（《晚清》第 136—137 页）。

三、维新派

郑观应的《易言》中提到：泰西各大学院中，各种书籍、规仪、器物无一不备。他在《盛世危言》中提出：大抵泰西各国教育人才之道计有三事：曰学校、曰新闻馆、曰书籍馆。把图书馆提高到了培养人才的三大措施之一。该书“藏书”一章尤为重要：一是对传统藏书的批判，二是对图书馆重要性的认识，三是倡导普遍设立近代图书馆，四是普遍设立近代图书馆的方法，五是向西方图书馆学习。他的这些思想对于西方图书馆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对于维新派提出建立图书馆的主张及创办学会学堂图书馆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晚清》第 151—165 页）。

康有为的《万身公法书籍目录提要及实理公法全书》集中反映了他的目录学思想；《桂学答问》向桂林学人推荐中西学书籍；《万木草堂讲义》专门列有“书目”一章，向学生讲解目录学。1896 年编撰的《日本书目志》，是他在向西方学习、寻求

^① 李希泌, 张椒华. 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 春秋至五四前后.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85

真理中,长期关注日本及其出版物,精心编撰的一部新学书目,同时又是鼓吹维新变法的一个政治工具。该书将全部图书分为 15 门:生理学、理学门、宗教门、图史门、政治门、法律门、农业门、工业门、商业门、教育门、文学门、文字语言门、美术门、小说门、兵书门,每门下面还复分为数目不等的小类。这个书目分类体系,是对中国延续了近两千年的传统的四部分类法的重大突破,对于后来新的图书分类法的产生也有一定的影响。

康有为的图书馆思想体现在以下诸书中:《公车上书》第一次正式向清政府提出了“设书藏”的建议,说明了图书馆在广开民智中的作用,并提出在全国普遍设立图书馆的建议。《上清帝第四书》,第一次正式地提出了开设议院和“开馆顾问”的主张。《京师强学会序》中提出“合众人之力,则图书易庀”(《晚清》第 179 页)。康有为亲自拟定的《强学会章程》认为最重要的四件事是:译印图书、刊布报纸、开大书藏、开博物院。此外,康有为还有《上清帝请大开便殿,广陈图书书》、《上海强学会后序》、《记筹办书藏经过》等著述,也表达他开书藏的主张。康有为的“开新”论的开大书藏思想,后来被孙家鼐的“存古”论所修正。

梁启超的著述也同时反映了他的目录学思想和图书馆学思想。作为康有为的学生,他曾经从康有为的《桂学答问》中精选出来 35 种图书,分析著录成 65 个款目,分成 5 大类(经学书、史学书、子学书、理学书、西学书),12 个小类,撰成了简明目录《最初应读之书》。1896 年,他在《时务报》上发表了《西学书目表》,该书目反映了梁启超对书目功用的认识——将书目的功用从指导读书治学上升到了学子自立和国家自强的高度。在分类方面,他将西学图书分为“学、政、杂”3 大类、28 小类,对我国传统分类体系进行了改革,其分类思想与新学和新政的变法维新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在著录方面,他以简明的表格形式代替了提要,在具体著录项目上也多有改进。《西学书目表》既对西学的传播和变法维新的高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又对中国近代目录学和分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人效法该表而改革分类法,或者专门著录译书的很多。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的《论学会》和《变法通议》,把“藏书”作为“兴学会”和“兴学校”的主要内容之一,反映了他主张建立图书馆的思想(《晚清》第 187—196 页)。

1896 年,李端棻的《请推广学校折》(梁启超起草)是有关设立公共藏书楼的重要文献,它继承并发扬了康有为的“开大书藏”思想:在全国普遍设立藏书楼、建设藏书楼的馆藏、建立藏书楼的管理制度。同样出自梁启超手笔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将“设大书楼”的思想又进一步具体化(《晚清》第 197—204 页)。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流亡海外。从康有为的《意大利游记》和《法兰西游记》来看,他对于图书馆的考察并不多,而且他关注的也不是图书馆的近代化,而是其古书的收藏和保存,认为“此又我中国号称文明所深愧也”。(《晚清》第 129 页)。而梁启超对图书馆的关注仍然不减,他的《新大陆游记》阐明了有关公共图书馆的几个重要问题:其一,公共图书馆的性质“为公共教育之机关”;其二,公共图书馆